



# 中国传统民居 装饰图形及其传播

冷先平 著



科学出版社



#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 及其传播

冷先平 著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4030229,010-64034315,13501151303

###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吸收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传播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美学、文化学和艺术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力求探索和挖掘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的艺术传播规律。本书注重理论层次的追求,在内容和体系上进行了新的拓展;论述例证丰富、深入浅出,符合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规律。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建筑学和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学生使用,也适合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冷先平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03-058706-0

I .①中… II .①冷… III .①民居-古建筑-建筑装饰-装饰美术-中国  
IV .①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5994 号

责任编辑: 孙寓明 / 责任校对: 董艳辉

责任印制: 彭超 / 封面设计: 苏波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16

2018 年 9 月第 一 版 印张: 13 1/4

201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318 000

定价: 10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前言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它以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时代特征鲜明的艺术形式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精神,千百年来备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根植于传统社会人们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文化创新的产物,并且被不断地使用和广泛地传播。就其装饰性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学者阿洛瓦·里格尔在《风格问题》中已经意识到“装饰研究是一门严格的历史科学”。对实用房屋的文化意义而言,佩夫纳斯的描述则更为具体:“要创造这样一个作品显而易见的方式是对一些实用结构进行装饰:建筑作品=房屋+装饰。由此可见,建筑作为传播文本,它所能够负载意义的实体就是装饰”。

因此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的研究,没有局限于“装饰图形”美术史的学科视角,而是运用建筑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相结合的理论视野,运用不同学科间视域、对象、方法等优势融会贯通“缀合”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与装饰图形的营造技艺、符号编码和传播规律进行研究,目的是使建筑学研究的理论得到补充,且更具解释力。同时,对装饰图形在艺术设计领域的当代再设计进行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以此促进其“协同”创新的现代设计应用和传播。

本书共分为七章,各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 绪论。**中国传统民居及其装饰图形的研究是伴随中国传统民居的研究而兴起、发展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间,我国学者、建筑装饰设计师及政府相关部门对此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创新与突破。对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在于发现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研究的不足以及可以创新的地方,并通过研究的理论工具和内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的理论阐述,确立探寻中国传统民居及其装饰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路径,奠定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的传播学视角的理论基础。

**第二章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文化信息的内涵特质。**本章从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的文化信息的视角,系统地分析、研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在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中的文化传统和内容体系、传播的表达方式及其地域性差异。

**第三章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的艺术符号系统。**本章依据传播符号学理论工具,深入研究作为非语言表达的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构成的物资材料、符号结构、信息编码及内蕴意义的链接关系,探求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

形的符号表达、传播交流的话语功能。

第四章 中国传统民居及其装饰图形的媒介性。本章根据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艺术生产历史形成特点,从信息传播媒介的层面展开研究,揭示在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艺术生产过程中,各种信息加工、编码、释义等生成的规律,证实它们作为艺术传播媒介的合理性、科学性。

第五章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图形的艺术生产。本章依据马克思艺术消费与生产关系的思想,从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图形的艺术生产关系、主体特征、生产方式等几个主要方面,结合大量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图形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的艺术生产,即其物态的“材料”和“形式”上表现为感性的、客观的、有目的的、对象化的艺术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图形艺术编码的内在规律。

第六章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的艺术接受。本章从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传播受众的角度,以聚落场域的社会群体为结构基点,将中国传统的接受观与现代传播学的理论结合起来,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挖掘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的使用与满足受众消费特点和发展的历史动因。

第七章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的现代实践。本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的结论和现代传播启示。

本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昆教授的悉心指导,以及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相关老师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紧迫和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恳请专家、广大的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冷先平

2018年5月



## 目录

<b>第一章 绪论 .....</b>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	1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工具和内容 .....	3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22
第四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26
<b>第二章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文化信息的内涵特质 .....</b>	30
第一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的文化特征 .....	30
第二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表达的内容体系 .....	41
第三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的地域差异性 .....	49
<b>第三章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的艺术符号系统 .....</b>	60
第一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传播的物质形态 .....	60
第二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的符号结构 .....	74
第三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符号的审美意指联系 .....	87
<b>第四章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的媒介性 .....</b>	91
第一节 作为媒介的中国传统民居建筑 .....	91
第二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文本媒介 .....	99
第三节 以传统徽派民居建筑及其装饰为例的建筑媒介可能 性分析 .....	110
<b>第五章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图形的艺术生产 .....</b>	115
第一节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图形艺术生产的主体 .....	115
第二节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图形的艺术生产关系 .....	121
第三节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图形艺术生产方式 .....	130
<b>第六章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的艺术接受 .....</b>	149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接受观 .....	149

第二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的视觉接受 .....	157
第三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受众分析 .....	166
第四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艺术接受的能动作用 .....	182
<b>第七章</b>	<b>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的现代实践 .....</b>	<b>185</b>
第一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研究的结论 .....	185
第二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传播的现代途径 .....	188
<b>参考文献</b>		<b>195</b>
<b>附录一</b>	<b>研究所涉及主要传统民居建筑调查名录 .....</b>	<b>201</b>
<b>附录二</b>	<b>现代民居室内装饰设计与消费状况调查 .....</b>	<b>203</b>

# 第一章

## 绪 论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传统民居存在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装饰及其装饰形态与建筑共同构建了灿烂的民居文化。中国传统民居及其装饰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1. 传统民居研究的奠基时期

它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的奠基人、开拓者朱启钤先生,在 1925 年以个人的名义,独资创建“营造学会”,开启了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研究先河。随后,营造学会于 1929 年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金赞助,并于 1930 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古代建筑研究的团体,其主要任务是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现存实例进行测绘、调查和研究,并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编辑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对我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营造学社于 1946 年停止活动。在 16 年内,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梁启雄、阚铎、王壁文、单士元和陈仲篪等一大批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仁人志士,广泛地参与了全国多达 15 个省 220 多个县 2000 多座古建筑历史遗构的摄影、测绘、调查和研究,形成对唐、宋、辽、金代的古建筑的基本的、整体的了解,掌握了大量的自魏晋到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实物遗存资料;在有关古建筑文献典籍的整理方面,这些专家学者通过对浩繁的古代典籍进行梳理、考辨,对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建筑历史发展脉络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个时期他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汇集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图 1.1)。《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不仅是学界后学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宝贵财富,也为古建筑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启钤先生指出:要用现代科技方法与手段对建筑实物进行调查、文献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使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学科创建等方面,都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本时期主要的成果有: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建筑史学家龙庆忠(非了)教授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和对河南、陕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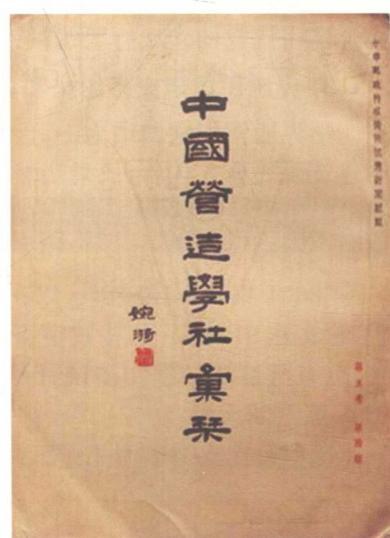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西等省窑洞的考察与调查,撰成了《穴居杂考》(龙庆忠,1934);20世纪40年代,刘致平教授以云南古民居为调查对象写就了《云南一颗印》(刘致平,1944);随后,刘致平教授又考察了四川各地的古建筑,写出了《四川住宅建筑》的学术论著(刘致平,1997);这类典型的研究还包括林徽因、梁思成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林徽因等,1935);同期,刘敦桢教授在考察了我国云南、四川、西康等地的大量古建筑、古民居的基础上,撰成《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刘叙杰,1997),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文中刘敦桢教授首次把民居建筑作为一种类型提出来。

上述开拓性的研究和论证为以后的民居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图文基础和研究范式<sup>①</sup>。

## 2. 传统民居研究的发展形成时期

这个时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著名传统民居研究学者陆元鼎教授把这个时期划分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50年代当以刘敦桢教授的《中国住宅概要》为代表。他在过去古建筑民居研究的基础上,和其创办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中国建筑研究室的同仁们一起下乡调查,发现在中国广大农村有很多完整的传统住宅,无论在建筑技术还是建筑艺术上都有着鲜明的特色。《中国住宅概要》完成于1957年,是较早地从平面功能分类的视角来论述中国各地传统民居的著作。它把传统民居建筑提到一定的地位,使传统民居建筑的研究得到全国建筑界的重视。60年代的传统民居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其广泛性在于这个时期对传统民居进行大规模的测绘、调查、研究,区域遍及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深入性在于研究更为系统,对传统民居的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要求有资料、有图纸、有照片。资料包括历史年代、生活使用情况、建筑结构、构造和材料、内外空间、造型和装饰、装修等”(陆元鼎,2007)。

从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在野外调查及文献典籍整理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民居作为一种建筑类型进行调查研究,突出建筑本体、建筑构造技术、物理效能等方面的内容。而在将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研究它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民族、语言、美学等方面则少有涉足,体现了单纯建筑学范围调查观念的局限性。同时,与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研究同期发生的西方传播学以及在此视域下的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及其装饰图形的研究处于空白。因此,本书所展开的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的研究,对于填补传播学的空白、丰富中国传统民居研究的领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 3. 传统民居研究系统化和多元化时期

学界通常把它归纳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这段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民居建筑研究渐入佳境,成果斐然。在这期间,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民居专业学术委员会相继成立,中国传统民居研究步入有计划、有组织研究的时期。

“2001年底止,经统计,以在报刊正式出版的有关民居和村镇建筑的论著中有:著作217册,论文达912篇。这些数字,还没把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出版的中国民居论著全包括在内。同时,也有所遗漏。据初步统计从2002~2007年9月已出版有关民居著作约448册,论文达1305篇”(陆元鼎,2007)。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民居研究兴盛的现实状况。但是,从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

<sup>①</sup> 范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的共同体的成员所有共同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整体中的一个元素,即具体性谜题解读;把它当做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作为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库恩,2003)。

饰的细分来看，“国内仅有建筑装饰（民居装饰）方面的著述，共有三部。依出版顺序分别是：华南工学院建筑系陆元鼎教授的《中国传统民居装饰装修艺术》（1992）、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楼庆西教授的《中国传统建筑装饰》（1999）和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沈福煦教授的《中国建筑装饰艺术文化源流》（2002）。三位著者均为执鞭生涯几十年的资深教授。其中陆著为图像集，影像精美，前附万字长文，总结概述了传统民居装饰装修的特征和风格；楼著文字十万，一路写来，驾轻就熟，叙述清晰，图文并茂；沈著试图纵向梳理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的历史源流、沿革和发展概况”（刘森林，2004）。这说明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及其装饰图形研究的成果比较少，同时也显示出在研究理论、方法上存在明显的不足。

在国外，传播学作为理论工具，自诞生以来，就被广泛地运用于很多领域，建筑学也不例外。

基于建筑语言的传播探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在那时人们对传播的语言、符号的性质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语言是观念的符号”，认为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学则是口语的符号（亚里士多德，1957）。这种观念体现在建筑中，就是通过建筑中的各种不同柱式、精美的雕塑、绘画，气势宏大的凯旋门等视觉语言，以象征的表达形式来传播诸多复杂的内在含义，并形成旷世经典。传播符号学作为一种新型的研究工具，最早开始涉及建筑领域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意大利，20 世纪 60 年代由意大利传入法国、联邦德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美国流行，并开始扩散到更广泛的范围。其中，1969 年由查尔斯·詹克斯和乔治·贝尔德编辑的《建筑中的意义》和 1980 年由杰弗里·布罗德本特、理查德·邦特和查尔斯·詹克斯编辑的论文集《符号、象征和建筑》两部文献具有重要意义。前者主要探讨了建筑学对传播符号学概念的使用问题，将建筑学问题处理为“语言”问题，使建筑学的语义可以在信息和传播方面得到理论关照；后者则系统地建构了建筑传播符号的理论。它们对当代传播学视角的建筑研究影响深远。因此，尽管国外没有直接的针对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的研究，但有关建筑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成果无疑能够为本书提供研究思路和理论基础。

针对本书的研究对象，作者调阅了 1990～2010 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在全国组织主办的历次全国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之《建筑与文化论集》<sup>①</sup>，由建筑史学分会民居专业学术委员会主持的共十五次全国中国民居学术会议的论文<sup>②</sup>和相关核心期刊、博士学位论文。截至目前发现对古建筑民居装饰图式及其传播进行的研究较少，博士论文尚属空白，显示出中国传统民居建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研究传播学视角的不足。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工具和内容

### 一、研究的理论工具

传播符号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无论是以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

<sup>①</sup> 该学术会议始于 1989 年的“全国第一次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历时至今 12 届共 12 集。

<sup>②</sup> 记有《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七辑、《民居史论语文化》一辑、《中国客家民居与文化》、《中国传统民居营造与技术》一辑。

索绪尔符号学,还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学和逻辑学为基础的皮尔斯符号学,均作为理论,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试图解释一些很难解释的东西,理论的基本目标是把陈述或者命题程式化,使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塞弗林等,2000)。也就是说,传播符号学可以用来解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因为这种出自理论的工具性,故作者选择传播符号学作为理论基础,以合理解决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 (一) 理论工具选取的原因

选择这样的理论作为本研究的工具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传播符号学理论视野开阔,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又不乏理论的普遍法则和概括性,这就能够为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的研究提供超越过往研究的启发和新洞见。

(2) 该理论不只关注视觉符号表象层面的显而易见的东西,它还关注表象下非语言符号的“内蕴意义”,也就是说,其解释能够超越具体的个案而覆盖一系列事件,从理论的高度为本书提供较强的解释力。

(3) 该理论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上,符合本研究探讨的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使本书得以根据传播符号学理论范式进行研究推行,并利用这种理论的工具性功能,合理地诠释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现象。

(4) 该理论的普适性、开放性决定了传播符号理论能够与时俱进,体现了在符号学历史中,符号学者研究、思考的理论成果的丰富、扩展和融合的过程。

(5) 该研究的启发性价值能够为“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的研究带来创新的思想,有助于提高本书的理论水平。

### (二) 传播符号学理论建构

#### 1. 传播符号研究的源流

毫无疑问,人类的思维和情感是在创造并使用符号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一过程可以追溯到人类蒙昧时期的原始文明,诸如史前岩洞壁画、图腾符号等。在人类的活动中,人们凭借各种符号进行信息传播。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的方式毫无疑问是使用非语言的符号。

在西方,传播符号学包括语义学、逻辑学、修辞学和解释学四个主要的来源,涉及的人物包括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及其继承者,以及西欧中世纪后期的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培根和奥坎等哲学家。由于符号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涉及所有的包含古文明记号、文字符、讯号符、密码、手语等人文学科。这种研究范围的过分宽泛,导致它在西方的人文学科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才真正意识到符号及符号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60年代,得益于多种学科在20世纪获得的重大进步,符号学研究才能快速发展和系统化。

在哲学方面,德国哲学家胡塞尔(1859—1938)的《现象学的主导观念》对符号行为、含义理

论和判断理论的独特理解和特别关注启发了符号学概念中的“意义显现”<sup>①</sup>表达方式，并从现象学的研究理论中借鉴、吸取了与意指作用概念相关的大部分内容。

人类文化学作为符号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交叉学科，为符号学提供了诸多研究对象，尤其是苏联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于1928年出版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在20世纪60年代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研究的进展。

“现代传播符号研究分为两大派别：一派视传播为讯息的传递，它关注的面在于传播者和接受者如何进行译码和解码，以及传播者如何使用传播媒介和管道；另一派视传播为意义的产生和交换，它关注的是讯息以及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文本的文化角色。”（费思克，1995）这两大派别实际上就是以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主要包括以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巴尔特、约翰·费思克、索莱尔、克里斯蒂娃夫妇、斯图亚特·霍尔等为代表的语言学派和以实用主义哲学、逻辑学为基础的主要包括皮尔斯、莫里斯、卡西尔、苏珊·朗格等的符号学派。

由于传播符号学流派甚众，理论繁多，本书在研究的理论工具选择上主要以西方符号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范式，并摘取各学派精义以关照中国传统民居装饰图形及其传播的研究。

## 2. 传播符号学理论成型及其基本观点

### (1) 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思想及理论受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及其继承者的神学符号研究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878年12月，索绪尔发表了他的杰出论文《论印欧系语言原音的原始系统》。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其代表性著作，他的语言学的基本思想不仅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而且对20世纪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由于索绪尔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深刻性，书中的思想成为20世纪结构主义哲学流派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

索绪尔的成就在于他从语言学出发，提炼出了结构主义思想和理论，并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创建了符号学。他指出，语言是一个表示观念的符号系统。符号的特点是：每个



图 1.2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sup>①</sup> 所谓“意义显现”就是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幻觉与分享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明确地写道：“我们建议把感知确定为非语言学的场所，而对于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这个场所内”（格雷马斯，2001）。

符号都有它的“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d)两重性质。“能指”即语言是声音印象，“所指”即符号的意义概念部分，由这两者构成的一个整体即称为符号。“他认为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声音印象，所以语言符号纯粹是心理的。这一观念导致了符号学的创建。”(余志鸿,2007)关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意指的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等到符号学将来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将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以完全自然的符号为基础的表达方式，例如哑剧，是否属于它的管辖范围。假定它接纳这些自然的符号，它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所以说，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是最为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索绪尔,1996)

索绪尔在把语言定义为符号体系时也指出言语是个人的、心理的、物理的，但是作为言语的集合，语言则是全社会约定的符号系统。其语言学理论和符号的基本结构成为符号学的基础。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65)，作为索绪尔的继承者，通过《语言学理论导论》《语言论集》这两本著作，奠定了结构语义学建立的认识论基础；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1902—1976)，关于“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考证了符号学能够借助陈述来掌握意义的可能，由此形成了符号学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

沿着结构主义的研究路线发展的继承者还有：巴尔特、索莱尔、克里斯蒂娃夫妇等。

## (2) 皮尔斯符号学理论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 1839—1914)是美国符号学创始人，几乎与索绪尔同期，他独立地提出了符号学理论。1878年，他发表的论文《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更清楚》标志着实用主义的诞生。皮尔斯生前并没有出版过一本哲学著作，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皮尔斯全集》，才使得其符号学思想为西方学术界所关注。

皮尔斯符号理论与索绪尔有所不同，皮尔斯符号理论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是一种经验理论和认知理论。受康德哲学的影响，皮尔斯更着重于对符号自身逻辑结构的研究。他把符号学范畴建立在思维和判断的关系逻辑上，认为任何一个判断都涉及对象、关系和性质三者之间的结合。与这三项范畴相对应，任何一个符号都由媒介关联物(M)、对象关联物(O)和解释关联物(I)三种关联要素构成<sup>①</sup>。它们形成一种三角形关系，符号就存在于这种三角关系之中。他再依据符号与它的三种构成要素的不同关联，将符号划分为9种下位符号，由9种下位符号的相互合成构成10种主要符号类别，它们反映了符号所具有的不同性质。

皮尔斯对符号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点。

其一，他给符号以确切的定义，并指出人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因此，符号理论就是关于意识与经验的理论。他认为，人的所有思想和经验都必须借助于符号，检验经验的最后标准是实践效果。

其二，索绪尔符号只有“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皮尔斯的符号则是一个层层三分的高度一

<sup>①</sup> 值得一提的是，与索绪尔符号学相比较，“媒介关联物”相当于“能指”，“对象关联物”相当于“所指”，“解释关联物”是皮尔斯研究符号的独特创建。

致的体系。由“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解释关联物”三个关联物构成的符号,充分说明了人类可以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认识客观世界,同时也指出,这种认识必须经过作为主体的人的经验的检验,体现出对事物的解释中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因而解释者就成为皮尔斯符号学的核心,“解释”项的创建,使皮尔斯的符号系统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其三,他的思想影响到许多后来的继承者,主要包括莫里斯、卡西尔、苏珊·朗格等,他们在皮尔斯之后继续沿着实证主义研究道路发展。

### (3) 结构主义与巴尔特《符号学原理》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在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他创造性地发展了符号学理论。其理论核心就是符号含有两个层次的表意系统。在巴尔特看来,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即“能指+所指=符号”,只是符号表意的第一个层次,而只有将这个层次的符号作为第二个表意系统的能指时,才会产生一个新的所指——即“内蕴意义”,或者说“隐喻”。

巴尔特一生都致力于揭示符号隐匿意义的研究。其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写作的零度》《神话集》《符号学原理》《S/Z》《符号帝国》《文本的快乐》《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恋人絮语》等。在他的这些著作中,始终贯穿着对语言、代码、符号、文本及其在意蕴的关注。

巴尔特的符号理论主要集中于《符号学原理》和《神话集》两书中,前者主要着重于符号理论的建构,后者则表现为符号理论的应用。

《神话集》是从传播符号的角度,对法国当时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做的文化批判。在该书中,巴尔特运用了“陌生化”<sup>①</sup>效果把符号学从语言领域扩展到现实世界,来分析当代社会,特别是传播媒介和广告。在法国 20 世纪 60 年代,大众传播迅猛发展,各种代码与讯息滚滚涌出。面对如此纷繁错杂的图景,人们往往视其为自然而然的“客观”现象,从而忽略或根本无视其中有一项共同的意义运作在起支撑作用。他无情地剖析了法国大众传播媒介创造的“神话”,揭露了它为达到自身的目的而暗中操纵代码的行径。他表明广告符号的实际效果就是说服我们相信消费者社会的某些特定的商品是绝对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和历史的,他们来自于人本身的消费欲望而非其他。通过对这些渗透了意识形态的符号文本的解构和批判,即“去神话”的陌生化过程,揭示“神话”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价值的运作,使人们“彻底丢弃对潜藏在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表象里的意识形态的天真幻想”(斯特罗克,1998)。

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创作于 1962—1964 年,他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为学生开了一门研讨课“意义的当代系统”。1964 年,他根据这门课的讲授内容写出《符号学原理》并刊登在大众传播研究所主办的《传播》丛刊 1964 年第 4 辑《符号学研究》专号上。《符号学原理》理论的突出贡献是不仅第一次界定了源于索绪尔符号学的基本概念,而且清晰地梳理了符号学的

<sup>①</sup> “陌生化”原产于西方的一种诗学理论,即所谓“惊奇感”。黑格尔认为只有当主体与客体尚未完全分裂而矛盾已开始显现的时候,即人在客观事物中发现他自己,发现普遍的、绝对的东西时,惊奇感才会发生,惊奇感是艺术起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源泉。后来,俄国的形式主义者极力推崇诗语的“陌生化”特性,强调诗的功能在于显现其能指与所指的不同一,认为艺术的使命不在于毕恭毕敬地模仿自然和社会生活,而在于对之进行创造性的“加密”和“变形”,从而使人们感知它,引发对事物的新奇感觉,使人们即使面临熟视无睹的事物时也能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感受对象的异乎寻常,非同一般,感受语言最原初的“诗性本质”。布莱希特把“陌生化”进一步上升到哲学上的认识范畴,认为它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特殊规律。他曾经把陌生化的实现过程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认识(理解)—不认识(不理解)—认识(理解)。巴尔特借用“陌生化”概念,将其应用于符号学(余志鸿,2007)。

主要理论,提出符号学的四个基本范畴: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与系统(即横组合与纵组合)、外延与内涵,从而使符号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sup>①</sup>。

第一,巴尔特在索绪尔符号学的基础上,明确了符号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符号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按照一切结构主义活动的方案(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研究对象的模拟物),建立不同于语言结构的意指系统之功能作用。符号学研究所采用的适切性,按定义来说涉及研究对象是意指作用。”(巴尔特,2008a)也就是说,符号学研究的范围要突破语言学领域,应该涉及所有的文化现象,为此,巴尔特把符号学定义为研究所有文化现象中的意指关系,奠定了意指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第二,巴尔特突破了索绪尔符号概念,在“能指十所指=符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现了语言符号系统之外的“功能符号”。巴尔特认为:“符号学的记号与语言学的记号类似,也是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例如在公路规则中绿灯的颜色表示通行的指令),但他的内质却可以各有不同。多数符号学系统(物品、坐姿、形象)都具有一种本来不介入意指作用的表达内质,而社会往往把一些日常用品用于意指目的,如衣服本来是用来御寒的,食物本来是用来果腹的,然而它们也可以被用来意指。我们打算把这些本来是实用物品的符号学记号按其功能称为‘功能记号’。”(巴尔特,2008a)当这种“功能记号”作为一个新的表意系统的能指时,就会产生新的所指——“内蕴意义”,从而使其对符号的解释能够超越具体的个案而覆盖一系列事件,从理论的高度获得较强的解释力。

第三,巴尔特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引入符号学领域,以涵指符号学的名义,在符号系统之间的意指关系中区分出两个意指层面,即直接面和涵指面。他在《符号学原理》中为此做了更具体、明确的理论解说。所有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层面(plan d'expression,缩写为 E)和一个内容层面(plan de contenu,缩写为 C),意指行为则相当于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缩写为 R):ERC。假定从这个系统延伸出第二个系统,前者变成后者的一个简单要素,第一个系统(ERC)变成了第二个系统的表达层或能指:

2 E R C

1 ERC

或表示为:(ERC)RC。这种情况即叶姆斯列夫所说的内涵符号学,即第一个系统构成外延层面(de notation),第二个系统(由第一个系统延展而成)构成内涵层面(connotation)。内涵系统是这样一个系统:它的表达层面本身由一个意指系统组成,外延是显而易见的字面含义,内涵是隐而不彰的附加含义(巴尔特,1999)。巴尔特关于涵指符号学中直接面和涵指面的观点,为符号系统之间的意指关系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陈鸣,2009),对符号内涵意义的分析构成了巴尔特符号学实践的根本。

第四,巴尔特按索绪尔提出的命题,采用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符号和符号系统的研究,提出了符号学系统的四组结构性要素: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组合与系统、外延与内涵。从而使对符号的“内蕴意义”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科学。

<sup>①</sup> 巴尔特的符号理论主要表现的划分依据李幼燕译巴尔特著《符号学原理》(2008a)、陈鸣著《艺术传播原理》(2009)及余志鸿著《传播符号学》(2007)等文献资料归纳整理。

上述四个方面表明,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是西方符号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融合了索绪尔、皮尔斯等符号学先驱的观点,并将符号学研究推向成熟,使之成为独立的学科,也为后来的传播符号学研究提供经典的理论范式。

### (三) 传播符号学作为理论工具的具体应用

#### 1. 传播符号学理论与大众传播

符号学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主要成果在于传播文本分析,即运用符号学方法分析蕴含一定意义的传播文本,这种文本分析的策略跟符号学分析所引起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方法基本相同,如吉兰·戴耶(Gillan Dyer)于1982年分析广告,约翰·费思克(John Fiske)和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于1978年分析电视。

美国学者约翰·费思克在其于1982年出版的《传播符号学理论》中将大众传播研究分为两大派别:一派认为传播就是信息的传递,是一种行为,故称为过程学派(process school),它视传播为影响他人行为或心理状态的过程,关注媒介如何编码、受众如何解码;另一派认为传播是意义的生产与交换,是一种产品,被称为符号学派(semiotic school),它关注的是信息与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即文本的文化功能,主要的研究方法是符号学。过程学派尝试结合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并将传播定位为一种行为;而符号学派则取材自语言学派和艺术等领域,并将传播定位为一种作品(约翰·费思克,1995)。

上述情况表明在由符号构成的、充满了符号的文本的大众传播过程中,符号学方法和研究范式,对理解和研究大众传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仅如此,它还对传播内容的分析、理解具有启发意义。

#### 2. 传播符号学理论与视觉文化传播

20世纪80年代,视觉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被纳入传播学研究的视野,符号学理论有助于视觉文化传播的理论建构。

视觉文化传播可以理解为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传播。在现代传播科技的作用下,传统的语言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正面临着这种视觉文化符号传播体系的挑战,也就是说它“要用视觉文化瓦解和挑战任何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化的企图”(米尔左夫,?)。符号学理论的介入在于揭示视觉文化符号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其传播形态。

符号学理论为视觉文化符号系统意义的研究提供诠释范式。在视觉已经发生转向的当今社会,从传播学的视角该怎样进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威廉·米歇尔,在这方面的见解值得注意:“视觉转向发生在英美哲学中,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语言学’,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与代码,并且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范这一假定作为开端的。无论图像转向什么,我们都应当明白,它不是向幼稚的模仿论、表征的复制或对应理论的回归,也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朝向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更应当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再发现……”(米歇尔,2006)。它表明,基于图像文化意义和价值上的分析,符号学理论是有助于视觉文化符号的诠释,是能够体现出对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文化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的合理解读。

#### 3. 传播符号学理论与产品形象系统

产品形象系统(production identity system, PIS)是在企业形象系统(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CIS)的基础上,针对市场需求建立起来的一套形象系统。较之于 CIS, PIS 更为灵活、高效,同时在作评估和产品检测时会显得更为直观,更有利于企业的投入控制和战略调整。

作为企业传播符号的具体应用,PIS 有着一体化的、整体的战略模式,包括产品文化内涵定位、产品卖点定位、包装色彩定位、包装主体元素制定及设计、印刷工艺制定及成本测算、终端系列展示及设计、包装形式分类制定、产品视觉风貌制定、广告及媒体的传播视觉设计、试销期产品跟踪测试及年度评估等 11 个具体的方面。

从以上 11 个方面可以看出,PIS 较之于 CIS,更关注的是在销售终端产品的表现能力,以及制定良好的产品形象来促进产品销售的力度。在战略上,通过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优化和配合企业的整体形象;在目标上,它能促使企业调整明确的市场方向;在形式上,它较之于后者更细化、产品分类更为详细;在投入上,则能用较小的投入和整体合力的作用,迅速启动市场;在传播上,它能以视觉最为优化的方式,将产品以整体的、系列的风貌展现在消费者面前,从而促进产品的销售和市场份额,为企业和产品树立良好的形象。

#### 4. 传播符号学理论与网络表情符号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如今已经成为事实,正如五十多年前麦克卢汉所预言的那样,作为媒介的互联网技术将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已经结成一个城市”,人与人的交流突破了传统的邮件、电话等方式,以互联网为平台的 BBS、MSN、QQ、聊天室、论坛等交流形式渐渐成为人际交流、信息传播必要的联系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网络次文化产物的网络表情符号就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

自 1982 年 9 月 19 日,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斯科特·法尔曼教授创建第一个网络表情符号以来,网络表情符号由少而多,由简而繁,由静而动,从单一到多层次递进构成种类繁多的网络表情符号,进而呈现出网络文化的特性。

传播符号学理论对网络表情符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作为媒介的互联网本身即是一种文化形式,不仅与外界文化互动,本身也有特定运用的逻辑。它的文化的表现方式可透过网络语言来塑造,这种语言包括网络文字与网络符号。当我们把网络符号中的表情符号当做一种网络次文化下的产物时,它的文化特征就赋予其内在的含义,由此获得在互联网中的情感表达和传播。在网络表情符号构成上,其言语符号和非言语符号的特质与传播符号学理论有诸多的参照点。例如,索绪尔认为所有符号都带有主观性和随意性。这在网络语境,尤其是网络表情符号运用中也相当明显。同样的一个笑脸,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意义,如一个面部红晕的 QQ 表情,可以表示腼腆地笑,也可表示幸福甜蜜地笑,也可以只是礼仪性微笑(郑玮,2010)。这样,从传播符号学的视角来解读网络表情符号的本质就较为合理。所以传播符号学理论有助于探究网络表情符号的运作逻辑和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何兆伟,2007)。

#### 5. 传播符号学理论与广告传播

广告是为了某种特定的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媒体,公开而广泛地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宣传手段。广告传播实际上就是信息传播。根据广告信息的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的两个基本特征可以看出,在广告传播中,传播符号是通过策划将繁复的商业信息进行压缩及提炼,并归结成为一个和目标消费者脑海中拟有的消费符号相对应的传播符号。符号是构成广告作品的最基本元素,广告传播的本质体现为对符号的操作,也就是说,在由符号构成的拟态环境中实现